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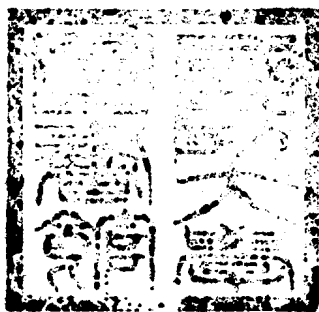


棋魔

——藤泽秀行自传

藤泽秀行 著

庄 玮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藤泽秀行自传

第一章 不名分文的名人	(1)
37岁当名人.....	(1)
名人战 冒险之举.....	(6)
生龙活虎的一年.....	(9)
开设名人战.....	(13)
向高川本因坊挑战.....	(15)
赌车英雄.....	(22)
贫穷的棋手们.....	(25)
遥遥领先的黑马.....	(27)
破绽百出的名人.....	(30)
名人的欠债.....	(34)
双雄会.....	(36)
封棋中的花招.....	(43)
第二章 幸运的故事	(48)
创设棋圣战.....	(48)
第一届天元.....	(52)
九死一生.....	(58)
棋圣诞生.....	(65)
夏威夷围棋之旅.....	(68)

借钱大王与棋圣	(72)
价值连城的半目	(82)
一年只赢四盘棋的好男儿	(88)
秀荣的再世(?)	(95)
通往名誉棋圣之路	(100)
三连胜四连败	(104)
死里逃生	(108)
第三章 胜负师的历程	(111)
家父与围棋	(111)
与秀哉名人对弈	(117)
天生的赌徒	(120)
失误	(124)
头悬梁 锥刺股	(129)
办报出书	(133)
围棋与将棋	(135)
赌场绝技	(139)
借款与成家	(145)
劲敌	(148)
时间与直觉	(153)
第四章 无悔于围棋的人生	(158)
胜负之本	(158)
对天元的向往	(161)
正宗	(161)
当今与未来	(161)
中国的孩子们	(162)
稻叶先生	(164)

芹泽博文君的围棋.....	(166)
藤泽研究会.....	(167)
中国的精英们.....	(169)
未来之梦.....	(173)

第一章 不名分文的名人

37岁当名人

1962年8月6日，我成了报界头号新闻人物、战后第一届名人。我生于1925年6月，当时正好满37岁。

那时我的段位是八段，当时的九段棋手没有现在这么多，不过也能数到10人以上，如吴清源、桥本宇太郎、木谷实、坂田荣男、高川格、藤泽朋斋，等等。那么，命运为何撇开上述高手，却偏偏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成为战后棋坛的第一位名人？且听下文再表。

那会儿，我因贪杯而负债累累，被称为穷困潦倒的“秀才”。

芹泽博文（将棋九段）说，当时知道我成了名人，最高兴的恐怕莫过于借钱给我的那些债主们了。在世人眼里，我的确过着破败不堪的日子。

我一夜之间成了名人，报纸上刊登文章，描绘了我深夜饮酒致醉的醉态，同时还作了“不名分文的名人”、“穷困潦倒的名人”之类的形容。

记者在结束有关我的报道时写道：“在里屋的蚊帐边上放着一副发旧的围棋棋盘，这一幕似乎暗示着我们这位新名人严峻的过去以及同样严峻的未来。”

“名人”一词，在我们这个年代被到处滥用，已经不再
有它原来那种尊贵的含义了。然而，在明治及大正年代，名
人却拥有相当高的权威地位，给人一种颇为神圣的感觉。

我立志当一名职业棋手时，便有一位这样崇高的名人，
即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第21代本因坊秀哉。他不仅棋艺达
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且人格也超凡脱俗，成为整个棋坛
的风云人物。

前来采访“新名人”的记者，要是脑子里已经有了秀哉
那么一位名人的印象，看到我这个醉醺醺的借钱大王，定会
受惊不小。他们居然将我自认为辉煌灿烂的前景，任意地预
言为“严峻的未来”。

那么就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世人们明白：我之所
以获得名人的荣誉，绝不是出于偶然的幸运，而是凭借我自
身的力量。

就在我入段那年，围棋名将秀哉去世了。传说这位名人
身材瘦小，体重跟孩子相仿，然而他一坐到棋盘前，却俨然是
一位巍峨的巨人。

川端康成曾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这位稀世罕见的围棋大
师的晚景。秀哉的音容笑貌，直至战后还留存在棋迷们心
中。由于人们对名人的期待甚高，所以在秀哉故世之后，便
再也没能选出合适的名人来。

我在日本棋院学习时，曾得到秀哉名师的指点。在11岁
那年，与这位大师下了最初、同时也是最后一盘棋。当时下
的是让五子局，我吃力地追着大师的思路，终于以胜告终。

比我大两岁的安永一先生，评价我少年时代下围棋时，
说我“简直就像摆弄原木似的”。想来当年秀哉大师遇到我

的“原木”，也只好苦笑一下而已。

那年他62岁，我比他小整整50岁。有谁能料到，我居然会成为继他之后的第一位名人呢？

围棋界首屈一指的名人，照例都是从职业棋手中选拔出来的，因而他必须拥有出类拔萃的实力。

从前，由于织田信长封本因坊算砂为“名人”，日本第一位名人便由此诞生了。此后，受幕府保护的四家嫡系互相争夺“名人”地位，争得难分难解，于是上面便规定：这四家中最杰出的棋手方可被推举为“名人”。

到了昭和时代，职业棋手被日本棋院及关西棋院等团体垄断，棋手段位的高低便成了评判棋手实力的一条重要基准。“名人”的候选人，那时必须同时拥有“本因坊”和“九段”这两项称号，而当这一选拔名人的条规颁布之时，谁都觉得九段是高不可攀的。

当时已确立了根据围棋大赛成绩晋升段位的升段制，后来，随着年轻的优胜棋手不断升段，原先那些九段棋手几乎已名存实亡了。

1949年，藤泽库之助（藤泽朋斋）以其在围棋大赛中的绝对优势，成为升段制确立以来的第一位九段棋手。随后，不断有新的棋手升至九段。

从江户时代沿袭下来的升段结构，采用由世代相传的师家协商推举的方法，每一代大致上限设上手（七段）四至五名，准名人（八段）一至两名。九段则极少有人达到。

本因坊桑原秀策被称为棋圣，他曾经在一年一度的御城赛中连赢19场，然而他的段位也只有七段，并没能追上他老师——八段的秀和。

根据围棋大赛升段规则，当初升段十分艰难，后来随着职业棋手的增加，升段渐渐也变得容易了。

而今，活跃在棋坛的九段棋手已逾60人，由此可见，今日的升段制已与江户时代大不一样了。这或许可以说是段位制的贬值，同时也可说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吧。

随着段位权威的下降，有关名人的规则显然也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棋院对此只得袖手旁观。

另外，举办围棋比赛的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以及每日新闻社三家主要新闻机构签订了一份协议：禁止将名人战列入工作计划。其实他们心里都渴望着名人的诞生，可是，那样会大大缩小别的棋赛的社会影响力。

这项协议制订于战后不久，大大限制了日本棋院的行动。

我于1960年再度当选为日本棋院的理事，并致力于名人战的筹划、实施工作。我自信能打破新闻社制订的那个蛮横无理的所谓“三社协定”，组织起新的围棋大赛。

促使我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活日趋繁荣，而职业棋手们的日常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我恳切地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当时，奖金额最高的本因坊冠军，收入也不过100万日元，而众多职业棋手的收入通常不到本因坊获奖者的十分之一。他们靠赛棋根本填不饱肚子，于是只好给人当教练或操别的副业，以维持生计。

棋手们的参赛收入不足以填饱肚子，是因为契约金实在太低了，这也是由于世人对棋手缺乏了解所造成的。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必须从舆论界着手，做些宣传工作。

我要将过去10年以来一成不变的契约金，一下就翻上几倍。

这时，新闻社似乎也有搞一些大型活动的意思，那么，对于公众舆论来说，名人身份无疑是极富魅力的。

当时的三大新闻社中，读卖社组织的棋赛正在由吴清源的十番棋系列比赛转为最强决定战，朝日社正在组织围棋大赛及最高位战，每日社则一直主办由战前延续至今的本因坊战。

其中，最高位战为日本棋院围棋大赛的延续，因而参赛者没有关西棋院的棋手，也没有九段的吴清源。另外，本因坊战也没有吴清源。读卖的最强战网罗了当时的一流棋手，但没有低一级的预选赛。可见，各赛区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举办名人战，就必须确立一套制度，以保证其优胜者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冠军。为此，不得不制订出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型比赛计划。

事实上，对于组织名人战，谁都感到难于下手，并且也害怕处理这件事。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开始努力使名人战变成现实。我认为这是我作为负责对外事务的理事的一项义务。因为即使名人战组织得很成功，我也不能借此发财，直接受益的将是那些参赛的棋手们。

那时，我想到了棋界的先辈们，他们为了将一个个单枪匹马的棋手联合起来，创建日本棋院，付出了何等的艰辛。在战后的混乱年月，他们为了日本棋院的重建，又付出了何等的、令人难以报答的心血。

因此，就是为了今天参加决赛的棋手，为了明天棋坛的

俊杰们，我也非得让这次名人战出名不可。这同时也是我对先辈所付出的艰辛的报答。

我根本没有想到，战后日本第一代名人的荣誉，竟会落到我的身上。

村岛先生（已故八段）对我说过，像我这样一个本属于“留级生”的人，居然成了秀哉之后的第一位名人，真是福星高照。但我的这种幸运也决非从天而降，其中必有自己的努力才行。

名人战 冒险之举

职业棋手靠下棋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下棋居然能挣来钱？然而职业棋手们的确就是按他们的地位来获得薪金的，每盘棋的收入从数万日元至数百万日元不等。

棋手们的比赛经过都留在了棋谱上。报纸、电视又将这些棋谱传播给读者、观众。棋手们下的每一着棋，每时每刻都牵动着棋迷们的神经，这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享受。尤其在电视上，不仅是棋谱，棋手们的一举一动都同样吸引着观众。因而棋手们下棋的收入，与其说是比赛费，还不如说是演出费。

报道围棋比赛的报社，为了吸引更多的棋迷们的注意，便渴望着有精彩的围棋比赛，以提高围棋栏目的影响力。这样便需要棋手们能表现出令人兴奋的招数，制造出紧张剧烈的竞赛气氛。为此，他们就得以相当高的金额去招募一流的职业棋手。

在我被称为棋圣的那些年头，报上说我，“每年下四盘棋便可悠然度日”。作为围棋界最高荣誉的棋圣称号，是自1976年开始设立的。我从第一任至第六任，一直蝉联了六任。

要保住棋圣的称号，必须在与挑战者的对局中下七番棋。这七番棋中，只要下赢其中的四盘，便算告胜。除了第一任以外，我从第一任到第六任，一直都是连赢四盘棋的胜利者，因而连续获得了该称号。

棋圣的奖金额超过2500万日元，于是便有了“每年下四盘棋便可悠然度日”的说法。如此算来，每一盘棋的价码便相当于500万日元左右。但这类比赛，简直是一种令人心力交瘁的搏斗，我的寿命恐怕都将为此减去几岁。

凡事总有好与坏两种结局，我参加棋圣战所得的收入，无疑是最不错的了。

资助棋赛、支付棋赛奖金的，有主办棋赛的报社、电视台，近来又加入了一些企业。

我所属的日本棋院，是专为专业棋手而设立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24年，旨在将原先零零散散、各自为营的职业棋手们聚集起来，并由职业棋手自己来经营。

该机构从事与新闻社进行交涉、发放毕业证书、出版和组织会务等项工作，目的在于普及围棋、培养围棋棋手，并使职业棋手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日本棋院尽量保护“食不果腹”的棋手，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下棋环境。

从前，在江户时代，职业棋手受到幕府的保护，他们的俸禄比较低，然而身份却很高贵。同时，棋手的谢礼也颇为可观，因而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宽裕的。

传说养育了本因坊道策的山崎家，每年可从皇族的细川家领用3200两银子。

后来，又有渔夫家的孩子立志成为一名棋手，结果终于在围棋界自成一家的传说。像这种普通人家的老百姓，也可以超越身份，一跃而为职业棋手，可见当时的日本棋院还是一个相当自由的世界。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昭和时代。这时候日本棋院虽然已不再有昔日幕府那样的庇护力量，但凡是日本棋院的职业棋手，生活都是有保障的，棋手们尽可以逍遥自在地下自己的围棋。至少在我的少年时代，日本棋院的情形就是如此。

接着，战争的爆发使整个世界都变得面目全非。战后，在席卷日本的围棋热的支撑下，棋手们的生活才得以安定下来。

然而棋手们的天地与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很大隔膜的，棋手们的生活也是一如既往地清贫。比如一天收3000日元教育费的惯例，一直延续了10年，棋手们还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昭和30年代的3000日元，相当于昭和20年代的3000日元的十分之一，而棋手们却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种贬值的现象。这件事听起来像笑话一样，然而它却是真实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不知已重演了多少回。

随着围棋界的繁荣，棋手们的人数也增加了。因而在棋院收入比较固定的情况下，每个棋手的生活其实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整天埋头于棋盘的棋手们，对于这类事情，天生就很迟钝。我悠悠哉哉地下着围棋，同时也在设计着未来，忽然间意识到了棋手收入的低廉，不由大为震惊。我作为最

高位冠军的保持者，只要成了本因坊的挑战者，便可以争取到日本棋院内数一数二的收入。尽管如此，我的年收入也不足100万日元，即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日元。

日本棋院那时正是一户清贫之家。1954年，也即昭和29年，我当选为日本棋院的理事后，便曾经企图在经营上改变这一局面。

到了1959年，当我再度当选为理事时，更是下定决心：要让名人战成为现实。当时值得庆幸的是：我与新闻界的最高机构，朝日新闻社的首脑进行了亲切的会晤，这或许是顺利的一面吧。

举办名人战，无异于向太太平平地安于现状的新闻界投掷了一枚炸弹。作为棋院理事的我，因此成了一名地道的“冒险家”。

生龙活虎的一年

1959年，我升为八段。尽管我自己的能力并未因此有了什么提高，然而社会对我的评价却有所不同了。我作为一名有望成为第一号种子的一流棋手，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同时，我的比赛成绩也一反过去当七段时的低落状况，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自1952年成为七段以来，我足足费了7年的功夫，才升为八段。在这期间，我获得了首相杯冠军。这项比赛类似今天的新秀锦标赛，是年轻棋手跳龙门的一个机会，没有一流棋手参加。

当时，除了围棋大赛外，我还参加过本因坊战、日本棋

院选手权战、王座战。其中，我在角逐1957年的本因坊时惨遭失败，1958年又在第三次预选赛中被淘汰。现在升为八段，这无论如何是我跨入一流棋手行列的第一步。

我还是七段的时候，只要在比赛中进行了奋力的拼杀，那么即使棋输了，心里也感到挺满足，棋迷们也很能理解我。

然而，一旦过了30岁，即使我在对局中下得十分精彩，但只要结局是输的，那么就立刻会被评论界指责为二流棋手；同时，观众看我的目光也挑剔多了。

因此，段位的上升似乎同时也意味着胜利，意味着向冠军靠拢。在我的比赛成绩徘徊不前的那些日子里，山部、曲、梶原三人都升为八段，并在最高位战、本因坊的角逐中异常活跃。比起他们来，我确实落后了一大步。

34岁这一年，我又一次参加了本因坊联赛，并且终于获得了决赛权。本因坊战是当时最高一级棋手的比赛，能有资格在决赛中向上一届本因坊称号获得者进行挑战的八名棋手，便被人们公认为第一流的棋手。

接着，在同年7月结束的最高位的段位战中，我以三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了升段资格。至于在以后的联赛中，我的进展也颇为顺利。

按照比赛的时间表，每年年初至5月为本因坊联赛，4月起又进入最高位战、快棋名人战、日本棋院选手权战、王座战等比赛。7月是日本棋院选举理事的时间。随着比赛成绩的提高，我的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同时，作为负责棋院规划工作的理事，我又不得不抓紧时间去制订有关名人战的方案。就这样，在这一年内，我既要对付比赛，又要制订规

划，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另外，这一年还首次设立了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我在1月份比赛的第一个回合中击败坂田九段后，势如破竹，到9月份一直杀到了宫下秀洋九段的帐前。结果，在与他进行的三番棋决赛中，我以二连胜获得了这项比赛的第一届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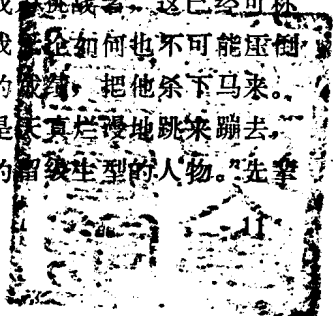
宫下先生比我大11岁，属牛，那年正好46岁。他的资格比高川先生、坂田先生都要老一些，当年曾是本因坊秀哉的得意门生。他那时正处于鼎盛之年，已经获取了快棋名人等几项称号。

“第一位”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称号，可是正是从这次比赛开始，我对围棋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觉。如今回想起来，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透露出“敏锐”的气息来。我的这种“敏锐”，倒也称不上什么藤泽式的棋风，但我确实把握到了唯有我自己才能感觉得到的某种东西。

第一位的称号，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在秋季的最高位段位战上，我屡战屡胜，终于成为一名挑战者。最高位是与本因坊、最强者相类似的称号，坂田与木谷九段已各自获得了两届最高位冠军。第五届由我向坂田九段挑战，从12月起到翌年（1960年）1月，共有4盘比赛。

我在七段时期总是徘徊不前，眼下刚刚升为八段，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超过九段棋手，成为挑战者，这已经可称是惊人之举了。因而大多数人推算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压倒坂田先生，谁料，我却以三胜一负的成绩，把他杀下马来。

“喜欢玩乐、赌博，嗜酒，总是东真烂漫地跳来蹦去，到处不得安生，真是一位讨人喜欢的留级生型的人物。”先



村岛先生（已故诤纪八段）曾经撰文对我进行了如上的描述，不知是赞扬还是嘲笑。而我却已加入了由吴清源、坂田、高川、木谷等人构成的超一流棋手的行列。

这次获胜，使我在心理上获得了解脱，可是在上升为八段、并获得最高位称号之后，我的生计却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些。

当时一位棋手的收入，与别的职业选手，如棒球选手相比，显然要低得多。

我获得最高位称号之后，所得奖金也不过100万日元。日本的职业围棋选手，即使进入了全国前五名，其年收入还是远远不如那些刚从高中、大学毕业的棒球运动员。围棋的荣誉称号为什么就这么不值钱呢？

我担任负责规划事务的理事之后，作为朝日新闻最高位称号的保持者，与朝日的首脑们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

渐渐地，我与被称为“朝日的借钱大王”的信夫韩一郎专务意气相投，成了朋友。信夫君是搞经营出身的，正像我是日本棋院的借钱大王一样，信夫君也是一个经常预支工资的天才，并且也同样有赌博的嗜好。据说他后来成了乐园内赌博性自行车赛的常客。他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交往对象。

我试探性地将名人战的构想告诉了信夫君。根据我的初步设想，举办名人战可能遇到以下三个问题：

一、三社协定的时效期限；

二、能否将日本棋院、关西棋院以及别的独立棋手们联合起来；

三、契约金。

其中，三社协定早已过了10年的期限，因而大致上不必

担心每日、读卖等三家报社会来要求索赔。至于第二项与棋手们的交涉问题，日本棋院完全可以由我去解决，关西棋院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此外，打通与读卖报社及吴清源君的关系也不会没有办法。如此看来，便只剩下契约金的金额问题了。

信夫君接受了我提议的金额数目：“让咱们试试吧！”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

开设名人战

信夫君是个很奇特的新闻界人士。在报社内部，大致上有编辑、经营、销售、工务等四大分工，信夫君则属于那种很擅长销售的人物，他在与其他报社的销售竞争上很有一手。

眼下的报纸销售业已趋于稳定了，然而在销售竞争激烈的阶段，没有像信夫君这样有气度的人，恐怕是很难取胜的。

我向信夫君提出的契约金为3000万日元，这相当于当时本因坊战奖金额的三倍。有关名人战的设想，便以这个奖金额为起点。然后，再在征求日本棋院全体棋士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对此，无论是每日新闻社还是读卖新闻社，都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因为角逐出围棋界的头号人物，是所有棋迷们的心愿，报社不可能去干违背众人意愿的事情。

构想已有了大致上的轮廓，不过，具体实施起来还需要花不少功夫。我终于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那是在1960年秋天，下一届理事选举结束之后。